

Alternative Facts On Knowledge and Its Enemies

另类事实

知识及其敌人

[瑞典] 奥萨·维克福什——著
汪思涵——译

欧洲科学院 | 瑞典皇家科学院 | 瑞典学院院士
奥萨·维克福什

后真相时代
捍卫知识
就是捍卫我们自己

瑞典11万高中生手中的公民素养之书
全球爆燃即刻翻译成近10种语言版本
避免认知偏误，用哲学的工具正确认识世界

哈佛大学教授
斯蒂芬·平克
倾力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

另类事实

——知识及其敌人

[瑞典]奥萨·维克福什 著

汪思涵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致谢

前言

第一章 抗拒知识

我们是否越发抗拒事实？

什么是知识？

证据

怀疑

否定信念的理由

抗拒知识

第二章 事实

事实虚无主义

对我来说是真的？

社会建构

特朗普时代的后现代主义

半杯水

这很复杂……

第三章 扭曲的思维

理性动物

为什么我们会相信奇谈怪论？

确认偏误

政治动机性推理

该如何解释我们的认知扭曲？

顽固与逆火效应

第四章 谎言、假新闻与宣传鼓动

语言与谎言

谎言

[我们为什么说谎？](#)

[知识与互联网](#)

[假新闻](#)

[怀疑的方法](#)

[阴谋论](#)

[虚假信息与专权国家](#)

[第五章 学校里的知识和批判性思维](#)

[瑞典学校系统的衰落](#)

[教育中的建构主义](#)

[学校研究和意识形态](#)

[建构主义的知识观](#)

[民主的知识观？](#)

[理解与批判性思维](#)

[第六章 我们能做什么？](#)

[完美风暴](#)

[批判性思考](#)

[信任专家](#)

[辩论与事实核查](#)

[总结：我们能做什么？](#)

[参考文献](#)

致谢

本书的一大主题是知识的社会性质，也就是我们有多么依赖彼此。本书中的知识自然也是如此，我有许多人需要感谢。感谢哲学家约纳斯·奥克曼（Jonas Åkerma）和克里斯托弗·阿尔斯特伦（Kristoffer Ahlstro），他们通读书稿后提出了许多改进意见（还帮我避免了不少错误）。感谢心理学教授马茨·莱坎德（Mats Lekander）审读本书的第三章，感谢研究员佩尔·科恩霍尔（Per Kornhall）审读本书的第五章，他们都提出了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感谢我的兄弟莫滕·维克福什（Mårten Wikfors），他从新闻工作者的视角审读了本书。感谢我的出版商克里斯特·斯图尔马克（Christer Sturmark），他通读并评论了全稿。感谢我的女儿克拉拉（Clara），她在Fri Tanke出版社暑期实习期间，帮助我核对了本书的参考文献并核查事实。书中遗留的任何错误（几乎肯定会留有错误，因为真理是客观的），责任均由我个人承担。

2017年年初动笔撰写本书第一版后，我到瑞典各地以抗拒知识和后真相为主题讲学，在此我想感谢讲座上的听众和其他演讲者。2017年2月23日，未来学研究院（Institute for Futures Studies）和瑞典研究委员会（Swedish Research Council）安排了一场讨论会，促使我开始撰写本书。感谢斯德哥尔摩大学哲学系，2002年从美国纽约回瑞典后，我就一直在那里工作，在哲学系的同事身上，我体会到了专业知识的真正价值。我从2019年1月开始主持关于抗拒知识现象的跨学科研究项目，该项目由瑞典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会（Riksbankens Jubileumsfond）资助，我从同事卡特琳·格吕尔（Kathrin Glüe）、托伦·林霍尔姆（Torun Lindholm）、耶斯佩尔·斯特伦贝克（Jesper Strömbä）和亨里克·埃肯格伦·奥斯卡松（Henrik Ekengren Oscarsson）那里学到了许多。

最后，我想感谢我的家人，他们在我忙于写作和讲学的时候一直支持着我。感谢我的丈夫亚当（Adam），他完美结合了理性和感性；感谢我聪慧的女儿克拉拉和汉娜（Hannah），她们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

前言

现在正是为现实而战的时候。我们的世界充斥着虚假新闻、阴谋论、片面的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否定科学，也有人在谈论专家之死。领导大国的政客任性而为，无视事实，甚至故意发布虚假信息，挑拨离间，破坏我们对知识机构的信心。再合理的知识都免不了遭到知识之敌的攻击，就连地球是圆的也有人质疑。我们生活在后真相和另类事实的时代。

“另类事实”俨然是当下情形的象征。这个词产生于对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就职典礼出席人数的争议。特朗普的新闻秘书肖恩·斯派塞（Sean Spicer，他只在这个位置上待了6个月）称，为参加总统就职典礼而来到华盛顿特区的人数，这一次是史上最多的。然而，证据并不支持这种说法。从奥巴马2009年就职典礼的照片看，当时观众的规模可要大得多，统计数据也证实当天卖出的地铁票要多得多。情况越来越明朗：斯派塞说错了。人们开始问：为什么他会去怀疑摆在眼前的事实？（他可是白宫新闻秘书！）总统顾问凯莉安·康威（Kellyanne Conway）在电视上发表了后来引发热议的声明：斯派塞只不过是陈述了另类事实。

她这么轻飘飘地把事实推到一边，激怒了我：哲学家是时候行动起来了。这就是本书的由来。我试图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理解知识受到的威胁，并提供对抗威胁所需的工具。本书的出发点是哲学。我们需要理解什么是知识，为什么真理是“坚硬”的，为什么不存在所谓另类事实（第一章和第二章）。同时，我们还需要明白为什么人类这么容易上谎言的当，理解有哪些心理机制会让我们无视摆在眼前的知识（第三章）。这些心理机制是内在于我们的知识之敌，不仅使我们倾向于片面、情绪化的思维模式，还和外在于我们的知识之敌相互作用，与蓄意的谎言、假新闻、虚假宣传混合成有害的物质，让我们深陷迷惑却不自知（第四章）。重要的是，我们该如何避免被卷入现在这股潮流？学校的作用自然是关键，但遗憾的是，我们的学校恐怕没有足够的装备来应对知识受到的威胁。对于知识的本质和批判性思维，在西方学校中流行的观念是错误的，无法帮助我们抵御虚假信息（第五章）。在本书末尾，我会谈谈该如何对付知识的敌人。不夸张

地说，这是我们时代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我们每个人都应当出一份力。

这是因为知识很重要。当然，我们有权相信任何事。但如果你只相信自己想要相信、希望相信的，而不是有了充分理由才相信，那么你就得不到知识，而这是有后果的。反疫苗运动导致麻疹在欧洲各地传播：2018年有记录的病例就有6万例，其中72人死亡；2019年，麻疹的传播速度翻了一番。而这原本不必发生。因为白宫里那些否认气候变化的人，美国退出了《巴黎协定》，地球将因此承受可怕的后果。研究表明，假新闻很可能在美国总统选举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它帮助特朗普在一些州以微弱的优势胜过了希拉里·克林顿。^[1]

当然，特朗普并非始作俑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利用假新闻的人。但他是后真相时代的化身，集这个时代的一切特质于一身。他丝毫不关心知识，不在乎自己的决策有没有事实根据，总是派没有专业知识的人去做管理工作。他与普京和欧尔班（Orbán）等强势领导人交好，把主流媒体形容为人民的敌人。他迷恋阴谋论，跟疫苗怀疑论者眉目传情，还热衷于散播错误或有误导性的消息。情况并没有随时间流逝而好转。根据《华盛顿邮报》（*The Washington Post*）的统计，在总统任期的第二年里，他平均每天会做出16.5个错误或有误导性的陈述，而任期的第一年里平均每天“只有”5.9个。截至2019年12月，特朗普在总统任期内做出的错误或有误导性的陈述已经超过了1.5万个。^[2]我开始写这本书的时候，很担心美国的民主制度能不能活过特朗普的总统任期。但这个体制不像我担心的那么脆弱——媒体和法院都挺住了。^[3]我现在比较担心欧洲，反民主势力熟练地利用种种虚假信息，在欧洲攻城略地。知识对民主社会很重要。专权领导人总会先攻击真理。与其逼着别人做事，不如诱导他们，让他们自己去做。当今的虚假信息因为隐蔽而尤为危险。利用虚假信息的人不是用那种明显的政治信息去轰炸大众，而是精心编造假新闻和片面故事，引发恐惧和焦虑，促使人们去进一步散播虚假信息。我们尚未意识到，扭曲的世界观就已悄悄潜入，成了我们自己的世界观。也有人立志去查证事实，但这样的做法很快会受到质疑，他们的可信度也会被虚假消息和阴谋论削弱。围绕现实的战争成了围绕信息来源可信度的战争，就连在我的祖国瑞典，也出现了信任两极化、政治化的倾向。后真相其实是后信任。

各种声音相互矛盾，我们很容易在一片嘈杂中失去方向，失去对理性的信心，不再相信我们有办法找到真理——而这正是宣扬后真相的使徒们所乐见的。希望本书能多少改变这种放弃的心态，带来一些

勇气和信心。我们可以对抗片面、没有根据的故事，揭穿虚假，冲破迷雾，最终找到有理有据、清晰明确之物。可信的信息来源、运作良好的知识机构的确存在，需要我们一起来保卫和支持。历史上，知识经受过许多次挑战，但每次获胜的都是知识。毕竟，如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所说，人是理性的动物。

于斯德哥尔摩
2020年2月20日

[1] Gunther et al. 2018. ‘Fake News May Have Contributed to Trump’s Victory’, *The Conversation*, 15 February 2018. 不过，假新闻起了多大作用很难判定，相关研究尚在进行。

[2] 参见 Kessler et al., ‘President Trump Has Made 15,413 False or Misleading Claims Over 1,055 Days’, *The Washington Post*, 16/12/2019.

[3] 然而，弹劾程序令人忧心，因为我们看到权力制衡这个美国民主的核心现在不起作用了。参见 ‘A Dishonorable Senate’, *The New York Times*, 31/01/2020等。

第一章 抗拒知识

我们是否越发抗拒事实？

《科学家称：地球有危险了，因为出现了一类抗拒事实的人》——2015年5月12日的《纽约客》杂志上，出现了这么一个引人注目的标题。文章称，这类抗拒事实的人表面上具有接收和处理信息的正常机能，但不知怎么，这些机能失效了。而且，给他们看的事实越多，他们似乎就越抗拒事实。研究者提出，可能是从听觉神经传到大脑的信息被堵住了，因此这些人的意识无法正常运作。

当然，这只是篇讽刺文章，作者是讽刺作家安迪·博罗维茨（Andy Borowitz）。他对当前形势有敏锐的嗅觉，也很会挖苦。2016年美国大选之前的一年，博罗维茨就预见到了大选后人们挂在嘴边的词：抗拒事实。总有人以种种方式致力于质疑对周遭世界的既有理解，比如阴谋论者、怀疑科学者、神秘主义者。但过去一年里发生的事似乎是前所未有的。突然之间，好像我们面对的不再是同一个现实，对这个世界的基本事实也失去了共识。我们不免会想，或许博罗维茨写的是真的，我们的大脑确实被什么东西塞住了。

这究竟是怎么了？我们能做些什么？要想深究下去，我们就得从头开始——从基础的哲学问题开始。

什么是事实？简短回答：世界的样子。小到日常琐事，大到宇宙起源，都有事实。有关于我们所思所感的心理事实，关于失业、通货膨胀、犯罪的社会事实，关于疾病和病因的医学事实，也有关于物种发展的生物学事实，关于基本粒子及其运动的物理学事实，还有关于我的厨房是什么样子、名人的爱情生活如何的事实。如果要回答得长一些，带上点哲学意味，那么事实就是使事实陈述为真的东西：事实是使真者（truth maker）。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陈述——比如“有匹马站在我的花园里”——要么为真要么为假，其真假取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存在什么样的事实。如果真的有匹马站在我的花园里，那么我的陈述就是真的。

你很快就能想到，有许许多多的事实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包括无关紧要到我们不屑于去了解的事实（我头上有多少根头发），以及难以知晓的事实（关于遥远星系中其他行星的事实）。很可能，有许多

事实是我们无法知道的，因为我们的认知能力有限。和宇宙创造有关的事实可能就属于这一类。宇宙如何能从无中创造出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能永远都无法理解。关于人类意识的事实大概也算同一类：大脑中的灰色物质，是怎么创造出我自己非常熟悉的多彩的主观世界的？即便人类是动物中认知能力最强的，人的能力也是有限的——包括“地球是圆的”在内的大量事实，是我的狗埃利奥特凭它那点认知能力所不能知晓的，同样，也会有很多事实超出人类的认知范围。

因此，说我们抗拒事实，这话多少有点道理。很多事实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因为我们不屑于知道；还有很多事实即便我们想知道，也不能够知道。当然，好奇心始终在推动我们去突破限制，因此最好别为我们能够知道的事实划定范围。我们能够借助新技术去观察遥远的星系，探寻微观世界。我们的科学解释模型越来越成熟，许多长久以来被视为超出人类理解范围的谜题，比如为什么我们扔出去的东西会落下，物种如何发展，生命是什么，都一下子得到了解释。现代神经生理学在探索意识的本质上可能已经有了进展。在这层意义上，当今人类抗拒事实的程度其实是最低的。

“我们并不抗拒事实，我们只是越来越抗拒知识。”

稍微一想就能知道，真正抗拒事实的人恐怕活不了太久。要生存下去，我们就需要不断吸收大量事实：既有像哪里可能有危险、如何获得食物和水这样的事实，也有与他人有关的事实。我们通过进化获得的能力，是借助视觉、听觉等高效获取周遭环境的信息，通过认知系统的处理将其转化为有助于生存的行动。听到丛林中传来大象的脚步声，你会赶紧跑开；看到水，你会把水灌到容器里。是不可能进化出完全不能接受事实的人的。安迪·博罗维茨也指出了这一点。他写到研究者希望抗拒事实这种情况会在未来消失，而根据初步的研究结果，在食物、水和氧气稀缺的环境中，人们会变得更加容易接受事实。

关于事实，下一章会有更多讨论。不过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用“抗拒事实盛行”来描述当今的状况并不是很贴切。并不是说突然之间，有很多事实我们人类没法吸收了。遭到抗拒的事实，比如关于气候、人口增长、疫苗、移民和失业率的事实，是专家和其他很多人都非常熟悉的。问题其实在于我们因为种种原因而不愿或不能接受知

识。我们并不抗拒事实，我们只是越来越抗拒知识。想理解这个重要的区分，我们就要去思考什么是知识。

什么是知识？

如果以“知识”为关键词上网搜索图片（有时候我会在讲课前这么做），就可能搜到突触之间有光照亮的大脑图片。我们很自然会认为知识存在于头脑中。我读一篇文章，记住其中的信息，然后通过考试或者讲课把我学到的东西告诉别人。但这么看待知识完全错了。

首先，我们要区分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我们称前者为关于“是什么”的知识（knowledge that），后者为关于“怎样做”的知识（knowledge how）。理论知识是你能在书本上找到的知识，有表述出来的具体内容，可以用“我知道什么是什么”这样的句型来表达。我知道“斯德哥尔摩是瑞典的首都”，“奥巴马是出生在美国的”，“电子是带负电的”。我们的日常知识里也有大量理论知识。我知道“我是出生在哥德堡的”，“现在是在下雨的”，“那辆车是停在停车场的”。实践知识就没有这样的思想内容。我们应该将实践知识理解为一种能力，做出某些行动的能力。对于实践知识，我们通常用“会”或“能”做什么来表示，而不是我们“知道”什么：我会阅读，会打网球，会骑自行车，会说英语。

理论知识和实践知识自然会相互作用。不管是否意识到，我们的一切行动都需要理论知识。比方说，如果想骑车，我就得先知道脚踏板的作用是让车子前进，人要坐在车座上——但我不太可能有意识地去想这些。长久以来，哲学家都在讨论实践知识能在多大程度上化约为这种理论知识。现在还没有定论，但只要你试过在电话里教人骑自行车（我就这么干过，当时是有个朋友借了我的车），你就会感到实践知识恐怕不仅仅是没有表述出来的理论知识。

实践知识显然不是存在于头脑中的。当然，骑车和打网球都要用到大脑，但说我们全身具有这样的能力好像更自然一些。而说理论知识不存在于头脑中，就没有那么好理解了。理论知识和我们的思想有关，但不存在于我们的头脑中。是这样的吗？答案是，知识的一个重要构成部分存在于头脑中，但知识本身不是。

哪个构成部分？前面提过，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事实，而我们只有在思考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時候，才会意识到这些事实的存在。但光是思考还不够。我可能很喜欢思考其他行星上是否存在生命这个问

题。读到关于发现特拉比斯特—1 (Trappist-1, 这颗不大的恒星在约40光年以外, 周围环绕着7颗行星) 的报道后, 我心想, 这些行星上肯定有生命。但是, 如果想要拥有知识, 光有这个想法是不够的, 我还得相信这些行星上有生命。我需要有信念 (conviction)。仅仅有一个想法 (或有一种猜想) 和持有一个信念之间是有关键区别的。如果你告诉我客厅里有只大象, 我心里肯定不免会出现客厅里有大象这个想法, 但恐怕不会相信你说的。

那么, “相信”意味着什么呢? 哲学家常常使用“持真” (holding true) 这个概念。我认为“那个行星上有生命”是真的, 意味着我相信那个行星上有生命。我认为“冰箱里有啤酒”是真的, 意味着我相信冰箱里有啤酒。为什么要区分想法 (反思、幻想、猜测等) 和信念? 很简单, 因为“持真”或“相信”这种心理状态, 在我们心理中起的作用与纯粹的想法或幻想完全不同。最重要的是, 信念对行动至关重要。如果我只是幻想冰箱里有啤酒, 我是不会去冰箱里拿啤酒的。换个更重要的例子: 走人行横道过马路时, 我只有在相信路况安全的情况下才会迈步。

知识需要信念, 从这一事实可以发展出一些有意思的推论。比如, 要拥有关于气候变化这个事实的知识, 仅仅读一篇讲气候变化的文章是不够的。如果我读的时候并不相信, 不认为文章的内容是真的, 那么我就没有获得任何相关的知识。也就是说, 传播知识不光要发布信息, 还得让人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这就是为什么传播知识特别重要。

因为信念在人类行动中扮演着特殊角色, 所以仅仅告诉别人情况如何是不够的。如果他们不接受我们所说的, 不相信我们所说的, 他们的行为就不会因我们的话而改变。人若不相信吸烟致癌, 就不会为此改变自己的行为。

“传播知识不光要发布信息, 还得让人相信这个信息是真的。”

信念至关重要, 这个事实还与英国哲学家米兰达·弗里克 (Miranda Fricker) 所说的“知识的不正义”有关。^[1]这种情况就是, 如果一个人的信念不被当回事, 总是 (因为性别、种族、阶级、年龄等方面的偏见而) 受到质疑, 那么这个人最终就会怀疑起自己的

信念，即使没有理由这么做。这样的人就被剥夺了原本可以享有的知识。

我们的大多数信念很琐碎，所以我们很少能意识到它们。我当然相信我有两条腿，但我上一次去想这件事是在什么时候？我也相信我公寓的地板够结实，我在上面走没问题。我相信马比蚂蚁大，月亮不是奶酪做成的。这些信念一直在我们的认知系统里，和我们做什么、怎么想都有关系（如果我觉得地板不够结实，我的行为就会和现在不一样），但只有在特殊情况下，我们才会意识到这些信念。此外，似乎还有许多信念是我们即便努力也不容易意识到的。当然，弗洛伊德已经谈到了这种情况，尽管他关注的主要是我们无意识的欲望（通常是性的欲望，比如娶母）。如今，弗洛伊德的理论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质疑，人们尤其怀疑其科学根据和可测试性。弗洛伊德自己认为潜意识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发现之一（堪比发现太阳系），但现在许多人认为，弗洛伊德所谓潜意识的作用（比如潜意识与神经症的关系）其实并不存在。^[2]不过，也有当代的研究表明，我们要知道自己相信些什么其实并不容易。

近年来，隐性偏见受到了关注。只需做个简单的联想测试，就能看出人们潜意识里对性别、种族等议题的臆断。^[3]这种测试旨在发现人们的“系统1”或“快思考”里那些还没经过反思批判的“慢思考”或“系统2”过滤的无意识想法。^[4]做这种测试时，即便是号称自己没有性别等方面偏见的人也会暴露出问题：比如，人们会把女人和家庭、孩子、厨房联系到一起，把男人和事业、力量联系到一起。我做过一次联想测试，看到结果时还是有点失望的。当然，怎么阐释这些结果很重要。一种解释说，那些其实是我们隐藏的信念：我可以声称自己相信女人和男人一样有能力成为工程师，但我内心深处的信念是女人在当工程师这件事上的能力不如男人。能支持这一解释的是隐性联想有时确实能影响行动。^[5]

不管怎样，显然，即使信念是种心理状态，弄清我们究竟相信些什么也并不容易，有时得通过人们的所为才能知道人们的所信。特朗普也许绝对确信自己是世界上最尊重女性的人（他是这么宣称的），但他的行为说明这只是自欺欺人。

由此，我们看到了知识的第一个构成部分：信念。信念这种心理状态对行为至关重要。说我们（有意识和无意识）的信念存在于头脑中，这应该没什么争议，尽管我们并不确定信念具体的所在。^[6]得益于fMRI（功能性磁共振成像）等测量大脑活动的更好方法，神经生理